

四十年前,他从这里走向世界

——陪洪汉鼎先生回永寿侧记

■王鹏程

2018年11月10日午后,老天下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古都西安笼罩在朦朦胧胧的迷雾之中,使得80高龄的哲学家洪汉鼎先生多少觉得有些遗憾。但一上车,老先生的表情却由凝重变为激动——他很快就要回到55年前他下放的那个小县城了。

1963年9月,本应1961年毕业却因打成“右派”而被推迟毕业的洪先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到陕西省永寿县县委工作——洪先生说起当时他到西安报到的情景无限感慨,由北京最初是分配到陕西省高教局,他本想去分到陕西省某个高校,谁知他一到陕西省高教局报到,却被下分到咸阳专区文教局,可是当他拿着省高教局的分配书函去到咸阳专区文教局时,第二天他就拿行李和书籍,从西安玉祥门乘车直奔永寿县——尔后辗转组织部、工会、永寿中学、县机械厂等单位,一直到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贺麟先生的助手,从25岁到40岁的人生最宝贵的15年青春,洪先生奉献给了永寿这块贫瘠的土地。无论是做驻村干部、工会干事、中学教师和工厂采购员,洪先生都没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没有忘记喜欢的哲学。他利用一切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不仅翻译了《斯宾诺莎书信集》,而且写下了潜心研究斯宾诺莎的50多万字手稿。他的中文专著《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和被德国同行誉为难以超越的德文专著《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在永寿,洪先生构筑了自己哲学大厦的基座。

2016年底,我在洪先生的回忆录《客居忆往》中得知了洪先生曾在永寿工作过15个春秋,激动和难以置信之余,我通过北大的于春松教授,联系上了洪先生。洪先生很兴奋,也很激动,在给我的邮件中,他回忆起50多年前他如何踏上永寿的土地以及在永寿的生活:

鹏程:

你好!真想不由于拙书得识你,你是到底的永寿人,立刻带来许多难忘的回想,特别是四十年前那第一天从西安玉祥门乘长途车到永寿,一下车从脚到脚全是黄土,只有两只眼在动,至今还历历在目。原想你会再往下分到某个公社,可是革命

老区人朴实,县委书记孙玉亭、王杰等领导把我留在县委工会,负责职工业余教育,最初就是负责建永寿县那唯一一条大路上的工人俱乐部,那是工字型。不知现在还在不在?图书、乐器、体育器材都是我负责购买的。……最后我就到了永寿机械厂,最初厂房也是我负责建造的,当时厂长陈国祥(我非常感激),他非常同情我,最后让我当采购员,常住西安,正是这样我有时间从事哲学研究。在永寿我经历“四清”“大批判”“文革”各种政治运动,曾到许多大队下放,从县委书记长到公社社长大队队长一直到农民,我有很多知心朋友。我的青春可以说就在永寿度过的。有些农村我还画了很多壁画(政治宣传画),我也在斋堂煤矿大礼堂留下大型宣传画。永寿我一直想念,但没有找到知音,现在得识你,我头脑就一下充塞着永寿画面。当时县剧团我也熟悉。可是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陪县委老孙书记下乡,农民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更不说农活完全不会。我就是这样在那里成长起来,当时我还有不少青年农民朋友……

《客居忆往》是学生的访谈,当然不可多提到永寿,我一直在写自己回忆录,那里可能有更多东西,但我想这必须要有你激励。以后我想争取去西安一次,这样我们可以详谈。我离开陕西你还未出生,我们真可说忘年之交。

有太多的话要说,还是等你来信后再说,再次感谢你。

祝好!

洪汉鼎

2016年12月29日

洪先生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巧合的是,我也曾在永寿中学任教一年,尔后从这里考研离开。洪先生在永寿时,我尚未出生。“文革”中我们县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能问我的父亲。洪先生还说,他也曾多次去我们镇下乡、驻队,并说到我们镇的大概位置和地貌。不敢想象,一个受过德国总统接见,并被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的著名哲学家竟同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有过那么紧密的联系。从此,洪先生每当忆起在永寿的时光,不时有邮件往来。2018年七八月份,老人本想赴兰州讲学,途中到西安,因为天气太热,加之身体不佳,终未成行。9月份,洪先生即告我,11月份他来西安开会讲学,如空闲,希望11月10日能陪他回永寿看一看。这一次,他终于踏上了阔别



2018年,洪汉鼎在永寿县机械厂旧址前

40载的故地。

按约定时间,那天我驾车到酒店接洪先生前往永寿。洪先生望着窗外,捕捉四五十年前记忆中的街道、建筑,言谈间不时露出对西安巨大变化的惊讶。他谈他当时在西安的画家朋友,谈他见过的作家,谈曾跟他在永寿工作后来调到西安的朋友,有些他记得名字,有些已经忘记。洪先生谈到当年的西北大学,谈当时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永寿籍教授,谈当年的西安机场,更谈起40年前,也就是1978年9月某天晚上,他在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家中,张先生夫妇可以说是洪先生同门(贺麟)的师兄和师姐,他俩对他讲,如果去北京不成功,就回西北大学任教。……车在拥挤的环道和高架上缓慢爬行,老人在脑海中里追寻当年的记忆,追寻自己的青春……

三点半,我们终于到了永寿。沿着西兰路(312国道),车以最慢的速度在行进。四五十年过去了,老人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县城只有一条街道,跟西兰路平行;医院和药厂对面;永寿中学的校门朝西兰路开,对面依次是车站、物资局和

粮食局。然而,永寿中学已迁往新校址,老校成了县职教中心,临街的门也已封上。当年,洪先生就是坐着敞篷的解放汽车,带着一箱子书和行李,在这个车站下车的。车站多年前已挪到斜对面,连着物资局和粮食局的这一片,现在已经是一大片居民楼。

沿着西兰路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即县政府,洪先生用手指着说,西边是县委(县政府),上面是公安局,他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就是在那转的户籍关系;东边是县委,县委对面是监军小学(现在已更名为逸夫小学)。洪先生当年到达永寿的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县委宿舍里,以后一直住到去永寿中学为止。我们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老人指着现今的办公楼说,这就是过去他住过的小楼,小楼前面两排平房是各部委的办公室,而如今成了篮球场的后院,当年是职工食堂,旁边有几排宿舍。当时开着一个后门,有一条小路,通向银行和街道。老人很激动,院子还是老院子,面积未增加,只不过老房子没了,盖起了新的房子。我问他,是不是去工会各单位看看,他说他去,我笑

着说,五十多年前的老职工来了,一定要报个到。

文化馆的东隔壁是一个待建的工地,洪先生指着这片工地很自豪地说:“这里曾是工人俱乐部,工字型的,是我负责的,也是我1963年来永寿的第一个成就。”在我的印象中,本世纪初这里曾是县电影院,当时已经很破烂陈旧了。可见洪先生当年负责的工字型俱乐部,很早就拆除了。洪先生似乎有些遗憾地站在锈迹斑斑的铁门前,留影。

我们沿着县城主街一路向南。“这里原来是供销社,这里是商业局,这里是……这里没变,这里变了……”洪先生指着熙熙攘攘的商铺,向我介绍这个小县城50年前的格局。我们的目的地是县机械厂,1970年到1978年,洪先生一直在机械厂担任采购员。住南走,有一个三角地,这里是县城的鸡蛋街,实际也就是农贸市场。洪先生说,这里跟原来一样,没有变。我们顺着靠北的岔路走,洪先生说,从这里往前,就是木器厂,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名字记不起来,他是七级木工,曾给我用包装木箱做了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折桌,此桌在精美,至今还保存着。问了几个人,不知道木器厂,也不知道那位高级木工。在挂着“永寿县建筑公司”牌子的门前,洪先生停了下来——“这里当年是建筑队。他们有几位技术很高的技工,只是不能设计,为了盖机械厂的厂房,我曾多次到这边来找建筑队的人施工。”从大门望进去,院子里破烂不堪,后面有两三孔窑洞分外显眼。见当年的窑洞还是原样,洪先生很兴奋——“当年我们经常坐在窑洞上面的空地上聊天、发呆。窑洞冬暖夏凉,很舒服。”窑洞现没有住人,门上都挂着锁。

街道正在基建。从西安到永寿,一路上所见,几乎都在修路。刚下过雨,路极难走,鞋子一会就沾满了污泥。洪先生兴致却很高,老远看见机械厂他当年设计的厂房还在,几乎是惊呼叫了起来——“二层的阁楼,是我特意设计的,竟然还在”。循声望去,看到一座一层半的大房,大概有十余间,半层阁楼几乎有一半塌陷,玻璃也几乎全无,剩下窗户底下的一点。我们找见了大门,洪先生说大门还是当年的,没有变。一进门,是一个摩托车修理铺,沾满油污的修理工带着异样的目光,看着洪先生指来指去。“说起这房子,还是我当年负责并设计的,当时永寿建筑队只盖房,不能设计,我哪里会设计,为此我专门去

西安,在西北建筑设计院里整整待了三天,找了好多图纸,终于选了几张合适的加以修改。我没有盖过房子,这是第一次”。看厂房上面的毛体字还保存着。”顺着洪先生的指引望去,“工业学大庆”几个毛体字依然很清晰。

洪先生曾在永寿中学短暂教过英语,我也曾在这里教过一年的语文。这里现在已成为永寿职教中心。在门房一间,洪先生当年住过的窑洞还保存着。校园里除了三四栋教学楼还是我15年前任教时的样子,其他都已面目全非。我们直奔校园西北角的窑洞。洪先生一下子就找着了当年住过的那间靠边的窑洞,现在已经做了小卖铺。

饭再走,洪先生建议最好吃永寿特色饭菜。我选择了一家熟悉的饭馆,主食汤烩馍,辅食醋粉、面筋、花生米等合成的素拼盘。我问洪先生能吃辣椒吗,洪先生说,当然可以,当年15岁的生存已经早把他铸成永寿的胃口。

有人将洪先生归入“悲情哲学家之列”,洪先生自己也承认,但他不悲天悯人,自暴自弃。洪先生在我们学校(西北大学)讲座时,有学生问永寿15年对他人生的影响,洪先生曾这样作答——这也是他在《客居忆往》中所说的:“这个过程特别使我懂得了人生苦难和背十字架苦行的意义。捷克著名作家卡夫卡曾经说过,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联系。静观这些年来自己智性的发展我不能佩服这一真理。一个人承受的苦难越大,就越能洞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一面,就越能凝聚起与命运搏斗的抗衡力。在这苦涩的15年中,我懂得了哲学与人生的根本联系,哲学思考与德行培养的根本联系。真正的哲学家不是知识的贩卖者,而是知识的履行者。哲学家的知识应与哲学家本人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哲学家所追求的道徳理想应以指导人生为重点。”《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洪先生是将哲学思考和德行培养融合起来的智者。

仁者寿。哲学家寿。中哲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西哲有康德、伽达默尔。关于永寿县,则有“永寿——长生不老”的释义。洪先生曾在永寿生活工作15年,永寿这片土地,学界以及我族也祝愿他如这些中西哲学家一样健康永寿,著述不绝!

汉译名著译者谭

许明龙:“译书难,重译经典最难”



许明龙,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退休之后开始为商务印书馆打工,先后翻译了《蒙塔尤》《圣路易》《论法的精神》《莱茵河》等9种,加上已经交稿、不久将要出版的《孟德斯鸠杂文选》,恰好10种,历时约20年,其中大多数已列入汉译名著系列。”退休前,许明龙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学术专长为法国史。没有接受过翻译专业训练,在翻译过程中仅凭直觉,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四个字:“达意、传神”。“达意”就是把作者的原意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而“传神”,就是尽力把隐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的好恶和情趣表达出来。

法国驻华使馆设立的傅雷翻译奖,将译作分为两类,一为文学翻译,一为文史社科翻译。在许明龙看来,这种分类大体上是恰当的,虽然同样是将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但文学翻译确实与文史社科翻译不

同,前者给译者提供的自由度比较大,而给后者提供的自由度小得多。“然而,人文社科翻译与文学翻译绝非泾渭分明,尤其是离不开叙事的史学著作翻译。比如,我与马胜利先生合译的《蒙塔尤》和我独译的《罗芒狂欢节》,都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作者不但以第一人称讲故事,而且往往还有故事中人物的许多对话。这种社科著作就与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了。更为典型的则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我们向来都把它称作‘书信体小说’,归类为文学作品,其实,孟氏在此书中常常大发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就此而言,此书应归类为社科著作。”

读者对文学翻译的臧否,大多限于译得好不好,其中包括译文是否通顺,文字是否优美,风格是否与原作一致或相近。读者对文史社科翻译的评价标准则略有不同,位居第一的要求是“对不对”,或者说“准不准”。文史社科书籍基本上都以阐发思想和理论为要务,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通常也不太讲究文字的优美。“我的一些译作,特别是《论法的精神》有幸得到许多读者的评论,不少读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误译,我深表感激。然而,从这些批评中我也发现,不同身份的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往往不尽相同。普通读者希望译文通顺易懂,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专业读者往往不大在乎译文的流畅与否,他们要求的是准确,绝对忠实于原文,为此宁可牺牲译文的可读

性,也许这是因为法律讲究严谨。若是依照这类读者的要求,那就更难做到。然而,人文社科翻译与文学翻译绝非泾渭分明,尤其是离不开叙事的史学著作翻译。比如,我与马胜利先生合译的《蒙塔尤》和我独译的《罗芒狂欢节》,都以叙事为主要手段,作者不但以第一人称讲故事,而且往往还有故事中人物的许多对话。这种社科著作就与文学作品比较接近了。更为典型的则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我们向来都把它称作‘书信体小说’,归类为文学作品,其实,孟氏在此书中常常大发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就此而言,此书应归类为社科著作。”

这些年,许明龙重译了孟德斯鸠的全部已版汉译著作:《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和《波斯人信札》。他的体会是:译书难,译名著更难,译经典尤其难,重译经典最难。已有的译本流传多年,大多已被读者普遍接受,况且,这些已版名著的译者并非等闲之辈,《论法的精神》的译者就是著名学者张雁深,在他之前更有更权威的《法意》,这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波斯人信札》的译本出自鼎鼎大名的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先生笔下。常言道,有千年的著作,没有千年的译作,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风,而且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没有从不出错的译者,重译孟德斯鸠著作的理由正是这两点。既要重译,就必须有所前进,哪怕只是一点点,否则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观愿望虽如此,客观效果则未必。《论法的精神》新译本虽然得到多数读者首肯,但也有人指斥,以译取代张译,是商务的一大败笔。

许明龙要为自己辩解的是,他对孟德斯鸠三部著作的重译,确实

下了很大功夫,付出了诚实的劳动。每处改动都经过再三斟酌,绝非恣意为之。试举一例,张雁深译honneur译作“荣誉”,而严复则译作“荣宠”。两位先辈都不错,然而能更好一点呢?许明龙在仔细认真研读原文的基础上,不是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视场合而异,把honneur时而译作“荣宠”,时而译作“荣誉”。其理由是,孟德斯鸠在论述君主政体时写道:“在君主国里,honneur指导一切行为和思想方法”。获得荣誉的原因和途径有多种多样,而荣宠却只能来自君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孟德斯鸠论述君主政体的章节中,他把honneur译作“荣宠”,而在其它场合,尤其是在与君主政体无关的章节里,把honneur译作“荣誉”。至于原文中的多数形式honneurs,则大多译作“赏赐”。

“重译的更大困难在于对作者本意的判读,一个句子,一段文字,不同的译者常常有不同的理解,遇到已版译本与我的理解不同时,尤其难以下定决心改动前人的译文,每逢此时,总是反反复复研读原文,仔仔细细推敲斟酌,绝不敢轻易落笔”。想要改动的或许只是一个句子,但为此必须研读的却是这个句子所在的整个段落乃至章节,因为一个句子不是孤立的,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准确把握。至于译文的风格,许明龙采用的是当代的汉语白话文,力求表达得准确和清楚。“我所追求的目标,是让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一

遍即可读懂,无需反复阅读同一句或同一段。”

毋庸置疑,人文社科翻译要求译者具备专业知识,然而,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不一定个个都精通外语,更不一定个个都是翻译高手。在许明龙看来,外语水平、翻译技巧和专业知识的对人文社科翻译家的三大要求。“我在这三方面都有较大欠缺,相比之下,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更大。我不但因外国史知识不足而误译,即使涉及中国史,也出现过明显的错误。”比如,《圣路易》第一章提到了成吉思汗,说他origine是蓝色的狼,作者勒高夫在这里是引用一部法文辞书中的相关叙述,而这部辞书中的这句话则译自中国的古籍《蒙古秘史》,原意是成吉思汗的祖先是蓝色的狼。“我没有读过《蒙古秘史》,对成吉思汗的了解也仅限于皮毛,于是未多加思考,望文生义之下,把这句话译成了‘成吉思汗原本是一只蓝色的狼’。”看到读者网上的批评后,他立即请教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陈先生对读者的指正给予肯定。“我方知因自己无知而犯了大错,在此书再次印刷时改正了误译。”

翻译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在许明龙看来,翻译过程中对原著研读的精细程度,是通常的阅读无法比拟的,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原作的理解。翻译了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之后,对这位作者的思想 and 理论的理解有一种近乎质的飞跃。我过去对孟德斯鸠的研究主要是他对中国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的

依据。重译了他的三部主要著作后,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不再孤立地解他的法学、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和理论,而是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从多个角度,而且彼此互有联系地认识这位启蒙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原先在我眼里的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平面人物,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人物。”

40余年前,许明龙进修英文时的一篇作业:海伦·凯勒的《给我三天光明》,被老师推荐给《英语学习》刊出。令他惊讶的是,这篇短短的习作竟然博得许多好评,不但被收入《英语名作佳译赏析》一书,而且还被教授翻译理论的老师引为范本。许明龙说,自己在做这份作业时,根本不懂任何翻译理论,不曾考虑过应用何种翻译技巧,唯一的考虑是如何用上好的汉语,表达这位闻名于世的盲人作家的想法和情愫。“按理说,我的法文水平远超英文,受到赞扬的怎么反而是英文译作呢?我反复思考,答案或许应该从工作态度而不是翻译理论中去寻找;我在完成这篇习作时,态度极其认真,花费的心思和时间特别多,真正做到了慢工出细活,为的是不让老师失望。由此我想到,做好翻译工作,当然必须具备各种必要的能力,然而,能力并不能保障必然成功,更重要的是译者的态度:是否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不以自己的昏昏糊弄读者,而是精益求精,始终把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放在心上,这才是根本。”

(本报记者陈青霞采访整理)